

談談臺灣現代文學中的 疾病、瘋狂與死亡

Exploring Disease, Madness, and Death in Modern
Literature of Taiwan.

文 | 廖淑芳

從 2006 年進入成大臺文系任教那學期，我就開設了一門「現代文學中的疾病、瘋狂與死亡」的課程，至今曾開過三次。開設這門課的因由，雖然與個人某些經歷與研究興趣有關，最主要還是感受到現代人精神上的承擔，與過去的傳統社會已經有太大的差異。而疾病、瘋狂與死亡的母題書寫之成為可能，也說明在識字率、個體意識及人權概念普遍提高的現代社會，這些屬於人類精神陰暗面的部份也得到更大的關注。

現代人精神上的承擔

從臺灣現代文學的發展來看，疾病書寫算是極大宗的類型。可以是寫實呈現臺灣社會過去的黑暗疾病史，如楊青矗《烏腳病庄》寫罹患烏腳病者受到疼痛的凌遲，治療不及終得鋸斷手腳，最後甚至自殺的悲慘遭遇；可以是平路《間隙》中罹患癌症後，對存在與死亡重新發出的探問，疾病成為將肉身的石礫磨為珍珠的轉折與間隙，是圓滿生命使之發出幽光的觸媒。正宗的疾病書寫往往從疾病意識的開始、發展、變化，在面對或背對之間，捉摸出因疾病而形成的獨特美學、倫理與宗教感悟。其中還涉及醫病關係，照護者與最親密的家屬間可能展開的種種互動衝擊。疾病持續，若不能痊癒，大概就是要面對死亡，疾病的書寫因此也往往與死亡書寫緊密關聯。

比如章緣短篇小說〈善終〉描述的便是一段姐妹因為照護植物人的母親，延伸出的家庭糾結，付出最多照顧的妹妹載著母親墜河自殺，卻沒能成功，反而成為另位植物人，必須讓姐姐來照顧，這究竟是對逃避一切的姐姐最終的懲罰？或者只因希望能為母親和姐姐減輕負擔？什麼是生命到頭最好的「善終」？這些書寫往往有許多引人深思之處，也往往呈現了隱藏在文化底層，根深蒂固的意識結構，是任何文明制度都極難解決的生命難題。

性／性別與自我認同

而這些生命難題最具體顯現在人類自我認同的意識切面，又往往與性及性別相關。比如黃春明〈鮮紅蝦——下消樂仔〉因為得了下消病變得陽萎淪為村人笑柄的主角，最終也失去對自我的生命意志；或王湘琦〈沒卵頭家〉中因為卵葩巨

大症不得不截去男根而意味的喪失男性尊嚴，使主角事業致富之後就算賠掉全部家當也要把那個被切下還標了姓名的卵葩買回來，卻沒想最後拿回來的卻不是自己的；或者如李欣倫〈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透過「尿道炎」的疼痛體感，以及對這病名的難以啟齒，逼視文化教養對女性身體的網綁；再如紀大偉〈肥皂〉以香味隱含的控訴——指出已然被污名的同志，一旦染上愛滋等於被判定社會性死亡。這些疾病觸及由古至今最個人、最私密的「下體」，如何成為性、性別、語言禁忌等交織著倫理、美學、認同政治等多重面向問題性的戰場，也往往由此帶引出該疾病書寫所呈現的人性悲憫與社會控訴。

還有另一個同樣容易成為交織著性、性別與自我認同等問題性的戰場，是與「身體」相互嵌合的「國體」，比如陳映真〈山路〉中為了被槍斃的政治犯同志李國坤家人奉獻一生的蔡千惠，終於將李國坤弟弟養大成人，卻在獲知未婚夫出獄後，發現自己早已淪為一隻資本主義的家畜而得了厭食症，這讓人不知如何以對的沉重故事，並不純然只是聖女蔡千惠自身的信念破產，更是對白色恐怖時代那些為理想而獻死者的另類致敬。在此，病體不再只是「身體」，病體亦即「國體」或資本主義此一「文化身體」的象徵。

同樣的，在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最後主角陳有三的頹廢，也可視為一種以病體隱喻的國體——臺灣人永遠不可能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集體敗北意識。而張文環〈父親的要求〉中，曾是臺灣青年陳有義左翼思想啟蒙者的同鄉人「阿貴」，原本出身富裕，在日本也參加了反對日本政府的左翼組織，最終卻因為順從「父親的要求」，返鄉做個「小市民」，出現思想轉向後的矛盾焦慮而終致精神失常。陳有三或阿貴這些出身臺灣的年輕知識份子，正是殖民地臺灣國體的化身，他們的疾病或瘋狂，正隱喻著臺灣國體的困頓與扭曲，讀之很難不令人感到欷歔。百年至今，臺灣面臨的國族認同問題並不因殖民地時代已然過去，和民主的進展得到解決，這些問題只是以不同的面貌困擾著今天的青年，更是臺灣人集體面對的命運。

因文明理性而被拋擲出來的人物

擴大來看，這種精神性的困頓與扭曲，更全面地展現在現代社會中，因為過度講究文明理性而被拋擲出來的人物身上。人類歷史上十九世紀末期曾被認為是一段轉變巨大的階段，而開始有了反抗，以唯物、理性與實證為主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也首次在文學、藝術上產生具有悲觀與頹廢色彩的「世紀末」氛圍。那些具體表現在身體上的現象，便是疾病、瘋狂與死亡，它們表面上是一種身體的問題，其實更多的是精神的問題。即使再歷經另一個世紀末，走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走在尼采《權力意志》中所謂的「未來兩個世紀，人類會像一部失速的列車一樣，頭也不回地向前奔去」的預言時間內，也就是，我們並沒能真正擺脫這個「世紀末」所代表的現代人被異化、碎片化的問題性。面對這個運轉更為快速、更加要求「透明」、「理性」的現代社會，脆弱孤獨的個體往往必須以冷漠、疏離的方式遠離那些無能面對與處理的，社會也因此充滿無愛的體制性暴力，其激發的可能，是反面的殘害別人、傷害自己，或者個人化的精神顛狂。因

此疾病、瘋狂與死亡的書寫固然最能顯現現代社會的問題，「瘋狂」尤其可以視為「現代文明」總體問題的具體病癥。

七等生〈精神病患〉便是一篇深入探討此一問題的佳作。小說以一位有意從事寫作的主角賴哲森被判定具有精神疾病開始，一方面在與精神醫師的懇談下回顧過往，另一方面則與童年友伴阿蓮重新相遇並相戀結婚，回顧的部份我們看到賴哲森過去居住過的馬束小鎮的遭遇，正作為一個「無愛世紀」的代表，小說充滿繁複的現代性糾結，但其個人追尋的無以定向背後，馬束小鎮的遭遇及發現自身有著與生俱來的梅毒命運，致使賴哲森雖然以不斷地性愛愉悅阿蓮，最終卻勒死了她。賴哲森最後的殺妻告白說明了，這位精神病患的殺妻暴力正是無能突破此一終極的無愛世紀的表癥。

另外，李昂名作《殺夫》更是一個長期在身體與精神雙重暴力下，導致以血易血的結局，殺夫當下的女主角林市，不再是沉默無告的自己，而是心神喪失的精神病患，她幻化成正在殺豬的丈夫陳江水，那也是陳江水曾經逼她親眼目睹的血腥。

難以脫離被隱喻化的處境

疾病、瘋狂與死亡之聯結，尤其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大抵如上，蘇珊·桑塔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書固然目標在剝除依附在疾病的各種想像與汙名化，讓疾病走出隱喻的迷宮。然而，正因疾病延伸而出的瘋狂與死亡與現代社會的問題性緊密牽連，涉及這些議題的書寫難以脫離被隱喻化的處境，也是自然的。

廖淑芳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曾任成大臺文系系主任、臺灣文學學會理事、芝加哥大學訪問學者。著有學術專書《鬼魅、文學敘事與在地性——戰後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天使與橋者——七等生小說中的友誼》、《臺灣文學史長編 17：探索的年代——戰後臺灣現代主義小說及其發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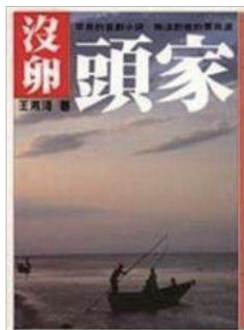
《烏腳病庄》楊青矗

■ 將烏腳病患面臨的悲慘處境做了深入撼人的刻畫，也批判了過去部份地方宗教對疾病醫療的消極處理態度，高度推薦。



《間隙》平路

■ 疾病如何可能成爲生命微光啟悟的時刻？這本書提供了動人的思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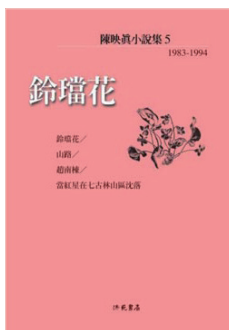
《沒卵頭家》王湘琦

■ 男性如何因病失去卵砲等於失去尊嚴的隱喻在作品中有深刻地揭露。



《有病》李欣倫

■ 我對身體與疾病冷靜、犀利又充滿柔情的凝視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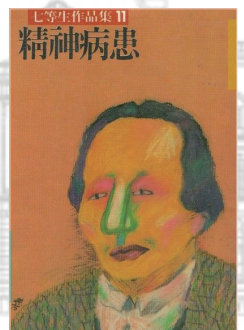
《鈴璫花（陳映真小說5）》陳映真

■ 其中〈山路〉一作透過「聖女」蔡千惠的厭食而死症，揭露了一段白色恐怖的晦暗歷史及其反思，值得反覆推敲。



《另一種生活》章緣

■ 其中〈善終〉一篇，處理長期疾病照護與家屬責任承擔問題，令人沉吟。



《精神病患》七等生

■ 透過賴哲森的疾病與醫療之旅，讓人看見現代社會深刻的問題性，值得反覆細品。



《殺夫》李昂

■ 說服力十足地呈現了女性在遭受身體與精神持續雙重凌虐後，如何可能心神喪失終致殺夫的過程。